

# 創造機會培育治港英才

□周八駿



知微篇

特區第四屆政府公開招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接獲逾一千一百份申請，反映香港大批專業人士和社會其他人士具有強烈的從政意欲。香港居民中越來越多人產生從政意欲，這是與香港政治體制的演變相一致的。

香港從英國「殖民地」管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在政治體制上要經歷根本性質的轉變，即：倫敦操控下的港督獨攬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轉變為北京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因應港英當局在九七前匆匆推行代議政制改革。「九七」後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將最終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席均由普選產生。

## 不斷總結問責制經驗

作為這樣重大的政治體制轉變的一部分，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特區第三屆政府又將政治問責制進一步推大至副局長和政治助

理。儘管由於種種因素，政治問責制的運作和成員表現不盡人意，但是，不能因噎廢食，必須不斷總結政治問責制的經驗和教訓，發揚優點，改正缺點，彌補不足，切不可「將洗澡水和嬰兒一起倒掉」。

傳統公務員體制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如同任何歷史上產生和發展的制度，也需要與時俱進，接受改良甚至改變。只有那些「殖民地」時代的頑固派，才抗拒和反對與時俱進地改革傳統制度。有人一邊高喊早日普選口號，一邊竭力抵制和阻撓政治問責制，不啻政治人格分裂。

總結特區第二屆、第三屆政府實施和擴大政治問責制的經驗教訓，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

第一，問責官員僅僅共同具有傳統價值觀不足以組成強有力的管治團隊；「一國兩制」與時俱進，要求傳統價值觀與時俱進。

無論第二屆政府主要官員還是第三屆政府主要官員和擴大問責制任命的副局長、政治助理，基本上，都擁有傳統價值觀。但是，這兩屆政府都未能構建強有力的管治團隊。

起初，人們以為原因在於，僅有共同價值觀不足以形成共同政治綱領，後者還有賴於問責官員們對於香港所面對的公共議題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相同的認知。譬如，關於公共政策優先程序要有共同

看法，關於某項公共政策的內容及其操作要形成共同意見。但是，正是後面這一點為以往各屆政府管治團隊所欠缺。

然而，深入分析為何以往各屆政府管治團隊欠缺關於公共政策優先程序以及關於某項公共政策的內容及其操作的共同見解，不僅因為他們缺乏關於公共政策的共同的理論基礎。譬如，關於市場與政府關係持有不同主張，更重要的是，他們缺乏關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全面準確的觀點。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活生生的、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創造性事業，當然與時俱進，不可能滯留或凝固於某一歷史狀態。

試想：如果信守傳統價值觀而抗拒與時俱進地引入新元素。那麼，無法準確地為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所遇到的問題「把脈斷症」，從而，無法「對症下藥」豈非必然？

第二，問責官員不能僅從傳統人才中挑選，而是必須開拓來源，努力組建能夠推進「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管治團隊。

傳統人才深受傳統價值觀薰陶，必須從非傳統人才中物色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成員。之所以新任行政長官在從北京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任命書後，返回香港，首先出席民建聯、工聯會的活動，要求

這兩個愛國愛港中堅團體向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推薦人才。這是前兩位行政長官未曾採取的新舉措。

## 提高管治團隊水平

第三，在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中完善提高管治團隊水平。

理想的狀況當然是組成一支能夠全面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管治團隊，但是，實際情況是，必須在推進「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過程中來打造一支能夠全面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管治團隊。

這要求從實際出發組成的管治團隊，積極地加快內部「磨合」和「整合」，在行政長官的政綱基礎上形成對外一致的管治團隊。

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強調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要面向市民、面向社會各界，既是強政勵治的需要，也是鍛煉和造就卓越「治港」團隊的惟一途徑。

實踐證明，僅僅具有出色的從商經歷，或者只是優秀的專業人士，不等於就是卓越的「治港」人才。

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乃至畢業於西方名校，可以是從政的前提條件，卻未必是從政的必要前提條件。第三屆政府委任的副局長、政治助理多數為社會所批評，便折射了這一點。

政治人才歸根到底是政治的大風浪中鍛煉成長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十五年的實踐，即使愛國愛港中堅團體的政治水平得到了提升，也暴露更多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不足。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民主黨應聘政助形同做騷

□谷風

作為香港反對派第一大黨，民主黨一方面無力應對公民黨的挑戰，影響力每況愈下。從這次四名新秀「應聘」政助一事，可以想見，如果繼續秉持此等「不負責任」、「羞於承擔」的路線，民主黨未來的前景必然灰暗至極，路途只會越來越窄。民主黨應以「負責任政黨」為目標，不僅為黨內利益負責，更為整體香港利益負責。



指點香江

民主黨昨日中午舉行了一場記者會，為四名申請特區政治助理一事，向公眾作出解釋。主持會議的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一臉尷尬，一邊重申民主黨立場，一邊為「不知情」作解釋。在其短短半小時記者會上，公眾看到一個極其可悲的政黨的形象。作為香港反對派第一大黨，民主黨一方面無力應對公民黨的挑戰，影響力每況愈下；另一方面又沒有勇氣擔當一個「負責任」政黨的角色，甘願畫地為牢，破城死守。從這次四名新秀「應聘」政助一事，可以想見，如果繼續秉持此等「不負責任」、「羞於承擔」的路線，民主黨未來的前景必然灰暗至極，路途只會越來越窄。

## 申請文員也不合格

按民主黨公布，這四名申請政治助理職位的分別為：政黨助理林嘉嘉、南區區議員區諾軒、羅健熙及柴文瀚。所申請的職位，涉及的政策局包括：民政事務、勞工及福利局、運輸及房屋局及教育局。按其解釋，申請「完全不稀罕」加入政府，而是要挑戰制度，試探梁振英的遴選委員會到底如何把關。其間還公布各人撰寫的一封信「申請信」，重申民主黨反對梁振英的立場。而張文光則為黨事前不知此事，為此感到「尷尬」云云。

記者會上公布的前因後果，以及強調民主黨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並沒有說服力，反而更像是一次預先安排好的「政治騷」。市民不必深察，便能輕易發現眾人言論的漏洞。首先，四名申請者，皆為民主黨着力培養的後起之秀，有的更是中常委，沒有理由不知道如此敏感重大事件事先

要通知黨內管理層，而當中的林嘉嘉還是黨主席何俊仁的貼身議員助理，說黨內高層完全不知，不如說四人是政治白痴。其次，四人說是要挑戰制度，向梁振英示威，更是讓人可笑。以其如此簡陋的「申請信」，別說是申請政助，就算是申請普通文員，也不合格，還要審談被聘請。如果民主黨四名「精英」會認為這種做法是「挑戰制度」的英明做法，無異於侮辱市民的智慧。他們要如何挑戰制度？是挑戰梁振英敢不敢接納他們，還是挑戰遴選委員會是否「弱智」？

## 「挑戰政府」自曝其醜

事件其實已經很清楚，所謂的「應聘政助、挑戰政府」做法，一不可能達到目的，二只會自曝其醜，民主黨這麼做，背後目的無非是以此來達到吸引公眾注意的目的，簡單的來說是一場「騷」，這在英美國家公眾早已見怪不怪。政黨為了捧新人、新人為了出位，就用各種手段來達到「見報」的效果。可想而知，今天的各大報章，民主黨四名新秀必然會「大出彩」，用他們的話來說，「又見報一次」。

作為香港反對派的一面旗幟，同時也是立法會的第一大反對派政黨，民主黨竟然墮落到以如此「弱智」的方式來「挑戰政權」，不能不讓人嘆息。實際上，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民主黨仍舊在重複過去舊有「從政」思維，甘願畫地為牢，死守破城。一年前支持政改方案的「新思維」，不過是曇花一現，其領導者仍舊無法從舊有窠臼中脫胎，不敢承擔責任、不敢面對挑戰，仍然在做「永遠的反對派」。不僅不敢支持他們認為是對的政府方案，不願更不敢讓年輕一輩加入政府試煉，視「加入政府」是洪水猛獸，擔心會失去道德高地、失去「民主」大旗、失去選民支持。

任何一個政黨堅守信念固然重要，與時俱進

、靈活變通，更是生存之道。民主黨應該做一個「勇於承擔」的反對派政黨。而承擔，意即「負責任政黨」。這是民主黨不可迴避，也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 死吃老本絕無前途

在這方面，民主黨諸人可以參考1950年美國政治學會謝茨施耐德的一篇研究報告。在這篇名為《走向更加負責任的兩黨制》報告中，首次提出「負責任政黨」概念。他認為美國政黨不夠有效率，也不是負責任的政黨，因此美國政黨應該改革，否則美國會面臨許多問題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包括：無法有效地解決美國面臨的許多亟待克服的難題，極端主義政治的危機，潛在的美國總統濫權的問題，以及美國民眾對政治和決策過程的不滿。報告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之道，是美國兩大政黨改革朝「負責任的政黨」方向邁進。

香港固然不是美國，彼此政治模式也完全不同。但「負責任政黨」應該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民主黨應該明白，堅持現有的「為反對而反對」，不會有更大的出路，充其量只會維繫舊有的支持盤，但面對不斷變化的選民心態，這種想法和做法，絕不可能為他們帶來更多的選民支持。民主黨應該以「負責任政黨」為目標，不僅為黨內利益負責，更要為整體香港利益負責。從這個層面而言，繼續跟風「拉布」、濫提修訂反對架構重組、禁止黨員加入政府，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黨」應該做的。回到這次事件本身，如果民主黨以高貴負責任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推薦四名新秀應聘政助，對於民主黨將來的發展，會是一條新的出路。任何事都有風險，但故步自封，死吃老本，是沒有前途的。民主黨應該要有這種魄力。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有破壞沒建設

保龍

# 革新文化發展理念



有話要說

從《大公報》的新聞版面上讀到許曉暉的一席話，話中表示她敢作敢為地要消除「搞文化搵唔到食」的現時社會存在的老觀念。借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來個顛覆，叫作「喝其一彩，敷衍成章」矣。

「搞文化到底『搵唔搵到食』」？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上來。以國外的經驗看，上世紀末九十年代到新世紀頭十個年頭，從美國崛起一個佔就業人口近三分之一、收入又佔二分之一的「創意階層」，到英國布萊爾倡議政府搞「創意產業」和育「創意自由」，顯示出不僅「搞文化是搵得到食」，而且還可以富國強民。這是有書為證的，撰著《創意階層的崛起》的佛羅里達可以用兩個數目來為許曉暉陣陣聲援：文化創意這個新興產業每天為地球村創造二百二十億美元價值、並高於傳統產業二十四倍的速度增長。由此看來，「搵到食」的不單是文化創意人，乃可惠及國民經濟，無論中外學者公認其是「為社會創造財富和提供廣泛就業機會的產業」。

## 「以商支文」促「公益文化」

新特首梁振英當選後，依照自己的競選承諾，提出對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架構進行重組，其中一項非常突出的舉措就是增設文化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文化局需要將現時不同政策局的文化工作統整起來，不但把「文化創意產業」統統接掌過來，而且還與教育局合作推廣「藝術教育」。這項新舉措對於促進創意自由和催促「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輩出，都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勿要被「搞文化搵唔到食」陳舊觀念束縛了，對於新特首梁振英「穩中求變」新施政理念推出新設文化局也不可不以為然。順便說一句，筆者與許曉暉相識於中央圖書館的一次文化活動，似乎也包括「中英劇團」在內的文藝團體與機構一設攤位及工作坊，吸引莘莘學子前來交流、互動、又學又問，熱鬧開闢。表演藝術委員會主席陳達文是我們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他將主禮此次活動的民政事務副局長許曉暉介紹與我認識。初次印象是她沒有官氣，平易近人，知我是從事滬港文化交流還表示今後應該加強聯絡，還特別用筆在名片上留下了聯絡直通電話號碼，可見其認真勁呵。

許曉暉又提到爭取商界對文化更多的支持，她以美國西雅圖與香港兩座城市進行實際對比，就「以商支文」來說，前者支援達十億而後者才一億。倘若許曉暉有機會當上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長，看她如何去積極游說本港商界「支文」哉。發達國家及資本主義社會，公益性的「文化蛋糕」做大做強，往往是靠股實富商和上流社會的資助捐獻，政府以減免稅賦或者頒發獎章頭銜來作嚮導及游說。特區政府可以發揮「一國兩制」的特別優勢，肯定比內地更容易做得又好又多嘛。跑馬跑個海洋公園；六合彩也作與可給本港文化中心建設添磚加瓦。

## 「兩個互動」建「文化香港」

筆者還特別注意到許曉暉提出了「兩個互動」，就是說在建設「文化香港」的途徑中，與「經濟香港」、「金融香港」這兩個「好好互動」。這也可稱之謂她的一項「文化創意」吧。這個「文化創意」也許與她曾經從事過經濟工作特別是金融行業，有着非常必然的聯繫。中央政府早已提出金融專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香港在這方面實在是可以在大有作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與香港金融專業互動變為大，也可催促香港文創以「CEPA」與內地金融專業融合、幫助內地文化創意產業「走出去」與國際金融專業融合，從而取得多贏共贏！期盼着「許氏兩個互動模式」的擴而充之，如此對於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大復興這「三大」中能發揮出應有的可行的作用。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 上合創新型國際組織模式

□陳群



國際視野

上海合作組織北京峰會已落下帷幕，它給人們留下的勃勃生機與融融暖意，令人難以忘懷。上合組織為何有此魅力？筆者以為，它是迄今在文明發展意義上，創造了新型國際組織的成功樣板；它是在主權國家仍為主體的紛爭中，創造了國與國平等、和平發展的成功模式；它是在西方冷戰思維的掙扎中，創造了競爭與制約、發展與平衡的成功典型。

## 確定十年發展目標

本次峰會最大亮點，是確定了上合組織十年發展目標。胡錦濤主席發言指出，「我們要確定本組織未來十年發展方向和目標，凝聚共識，開拓進取，努力實現上海合作組織新發展，為各成員國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新的貢獻。」他提出的「高舉四面旗幟」，成為十年發展目標的綱領：高舉和平、和諧旗幟，努力建設和諧地區；高舉反恐、維護旗幟，堅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各成員國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高舉合作、發展旗幟，努力實現共同繁榮；高舉開放、合作旗幟，努力擴大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影響力。「四面旗幟」反映出「上海精神」的精髓，即新的安全觀、新的發展觀、新的合作觀、新的文明觀以及世代友好和構建和諧地區的

全新理念。這「四觀」與「和諧地區」理念，使上合組織超越了迄今所有國際組織，為二十一世紀乃至未來如何建立新型國際組織，開拓出一條嶄新的路徑。

本次峰會另一大亮點，是中國提出「成立睦鄰友好合作委員會」建議。胡錦濤主席《維護持久和平促進共同繁榮》講話提出，「中方建議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睦鄰友好合作委員會，『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解決存在的問題，努力構建和諧地區，為本地區各國人民建設和諧和睦的家園。』」筆者以為，從未來文明發展的視角審視中國建議，無疑是上合組織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

## 西方沉溺於冷戰思維

凡以客觀公正眼光看問題，上合組織是「一心一意謀發展」「全心全意保和平」的新型國際組織？然而，卻遭到西方媒體質疑，有媒體稱「上合組織將發展成中俄主導下的反西方同盟」，有評論稱「上合組織可能發展為『東方北約』」。《華盛頓郵報》認為，「將對美國的影響力形成『制衡』」。《紐約時報》報道說，「將衝擊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半島電視台報道說，中俄正在「努力打造一種新模式，以挑戰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霸權』」……

筆者以為，這是當代西方冷戰思維的典型表現。蘇東解體後，原社會主義陣營嘩嘩如大廈傾覆，「東方壓倒西風」的論斷似乎也被颺到九霄雲外。這一度令西方喜出望外，布熱津斯基《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仍把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系統化理論化，主張「盡早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

國際秩序」，而對二十一世紀文明重心從西向東、從北向南轉移的大趨勢缺乏認識，表現出美式冷戰思維與文明局限。2003年以來，美國在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亞挑起戰火，在科特迪瓦、敘利亞、也門製造動亂，在伊朗、東亞製造衝突，特別是近期高喊「入亞」，釀成中國南海的空前鬧劇……所有這一切，無一不是西方冷戰思維仍在作祟。美國在擊斃本·拉登的同時，不斷在全球製造着更大的麻煩。二十一世紀初西方陷入歷史性衰退，但仍未治愈「集體近視」，仍沉迷於霸權夢想之中，沉迷於冷戰思維之中。這與上合組織形成了天壤之別。

## 不似北約勝似北約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北約東擴」天經地義，「上合組織」卻大逆不道。事實上，上合組織與「北約」等冷戰產物完全不同，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为民表示，上合組織之所以煥發出勃勃生機，在於其走出了一條新型區域組織合作之路，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創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組織憲章》規定了該組織「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其他國家和組織以及對外開放的性質，不存在演變成軍事政治集團的可能性」。

筆者以為，上合組織不似北約勝似北約。何也？一方面，其建立宗旨、組織模式與發展趨勢符合歷史潮流；另一方面，其維護和平、抵制霸權、打擊「三股勢力」的決心亦不可小視。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